



甲午战争百年祭

从笑难 著



华夏出版社



甲午战争百年祭

丛笑难 著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一九九四年

(京) 登字 045 号

甲午战争百年祭

丛笑难 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91 千字

199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080-0387-X/K·063

定价: 6.90 元



丛笑难,1924年生
于山东省威海卫。1939
年参军。1954年开始研
究中共党史,获北京政
治学院“先进教学工作
者”称号。集体编著《中
国共产党历史讲话》,获
全国一等奖和全军荣誉
奖。受聘担任解放军政
治理论教材编审委员会
历史组组长,主编《中国
革命史》获全军特别奖。
其他著作有《世界近代
史》等。曾荣获“三级独
立自由”和“三级解放”
勋章。离休后获“独立功
勋荣誉章”、“从事国防
教育三十年”和“全国老
有所为精英奖”奖章。

目 录

引 言 一衣带水的两个邻邦	(1)
第一章 中华帝国的衰落	(4)
第一节 盛极而衰的清王朝和西方列强的东侵	(4)
第二节 闭关锁国挡不住洋人的坚船利炮	(10)
第三节 有人混水摸鱼 有人趁火打劫	(16)
第四节 自强机遇的延误和丧失	(21)
第五节 不败而败国势更衰	(32)
第二章 岛国日本的崛起	(38)
第一节 历史厄运降临旭日之国	(38)
第二节 推翻封建统治“倒幕”获胜	(41)
第三节 “明治维新”改革的成功	(46)
第四节 “富国强兵”与武装侵台	(52)
第三章 战争的起因和准备	(61)
第一节 蓄谋已久的日本“征韩”阴谋	(61)
第二节 日本的侵华战争准备	(67)
第三节 中国的练兵和海防建设	(73)
第四节 是谁点燃了战争的导火索	(81)
第四章 战争的爆发和经过	(90)
第一节 丰岛、成欢不宣而战	(90)
第二节 平壤攻防战和清军的溃败	(98)
第三节 争夺制海权的黄海大海战	(105)
第四节 突破鸭绿江防和攻占旅顺口	(113)

第五节	威海卫失守和北洋水师的覆灭	(122)
第六节	踏雪卧冰战辽东	(137)
第五章	中日两国议和签约	(151)
第一节	清廷求和与广岛拒使	(151)
第二节	重开谈判但不停战	(157)
第三节	澎湖列岛战火又起	(164)
第四节	马关受辱被迫签约	(168)
第五节	俄德法联合干涉还辽	(181)
第六节	拒约与换约之争和“公车上书”	(190)
第七节	心向祖国誓死保台	(198)
第六章	百年后的历史再思考	(209)
第一节	维新改革者胜 腐败守旧者败	(209)
第二节	两军对战论得失	(214)
第三节	战后中日国力的消长	(221)
第四节	山河破碎勿忘瓜分狂潮	(226)
结束语	重温历史教训 珍惜中日友好	(235)
附录一	甲午战争大事记	(238)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42)

引言

一衣带水的两个邻邦

日本国，是位于太平洋西北部、亚洲东端的一个岛国。全部国土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个大岛和几百个星罗棋布的小岛组成，总面积三十七万二千一百五十一平方公里。首都在东京。十九世纪中叶，全国人口共约三千万。除北海道有少数阿伊努族人居住外，绝大多数日本人都是大和民族。

日本和中国隔海相望，最近处距中国大陆仅四百多海里，是一衣带水的两个友好邻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相互来往的文字记载。司马迁编著的《史记》，记有秦始皇派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东渡大海去“三神山”寻求仙药的故事。日本的歌山县新宫市还建有徐福墓和徐福祠。汉朝以后的中国史书，对日本使者的来访都有记载。公元五世纪，日本曾派人来中国聘请各种工匠，传授农作物种植和纺织等技术。中国东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劳动人民因为不堪战乱之苦，纷纷避迁日本，从而都推动了两国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交流。

至唐朝时期，随着造船技术的改进和对海洋气象知识的积累，中日两国的来往更加密切。中日之间有两条航线。北路，自日本九州向西，经朝鲜半岛至中国的辽东半岛或山东半岛，沿海岸线航行比较安全，但费时较长。南路，自九州沿琉球群岛南下，渡东海至长江口或宁波，航程较近但比较危险。据日本史书记载，自公元630年至894年，二百多年间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除使者、翻译和水手外，还有僧侣、留学生和工匠，一次就有五六百人同

行。唐王朝也曾多次派出使臣，携带礼品进行回访。

鉴真东渡日本的感人事迹，至今仍被传为中日友好的历史佳话。应日本僧人的邀请，扬州名僧鉴真率弟子及工匠百余人，在十二年间五次东渡日本，都因为遭遇风暴而失败，数十人因此而献出了生命。公元753年，年已六十五岁且双目失明的鉴真，偕同二十多人第六次渡海成功。在日本古都奈良兴建唐招提寺，传授佛教经典和中国医学，直至十八世纪，日本的药袋上仍印有鉴真的画像。鉴真对日本所作的贡献长期受到日本人民和医药界的敬仰和怀念。为纪念鉴真而塑造的干漆座像，被定为日本的“国宝”，一直供奉在唐招提寺内。日本学者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等人，在长安研究唐朝的政治和文化，对增进中日两国的友谊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友好交往有利于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国的冶炼、纺织、造纸、印刷、陶瓷等生产技术；儒家学说、古典医书和中草药、历法、算术、诗歌、音乐、书法和围棋，都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早期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日本的古都奈良和京都，都是仿照中国长安的城市布局和建筑结构而建成的，具有鲜明的唐代建筑艺术风格。日本的文字，是以汉字词汇和日本字母相结合的独特语言工具，反映了中国文字的影响。日本的精美漆器和折扇，也相继传入中国，日本宝刀则受到中国武士的喜爱。

友好交往也促进了中日贸易的发展。北宋时的一百六十多年间，中国有据可查的赴日商船有六七十次之多。日本商人也冒着风浪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有：丝绸锦缎、皮革、药材、瓷器、砂糖等。日本输出的货物有：金、银、铜、硫磺、水银、刀剑、折扇等。双方互通有无很受欢迎。

元朝建立后，成吉思汗连续发动侵略战争，蒙古骑士远征欧洲，侵略亚洲各邻国，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了战争的灾难。1274年，元军一万五千人自朝鲜南部出发，乘船攻占日本的对马、壹

岐两岛，进逼九州。日军十万赶来抵抗入侵者，元军被迫撤退。1281年6月，忽必烈又以中国使臣被杀为借口，调集十四万元军，舳舻相衔而进，兵分两路再次攻日。8月初，飓风大作海浪汹涌，舟船相互撞击沉没，元军或落水溺死，或被严阵以待的日军杀伤，或俘虏，生还者仅十分之二三。在被日本称为“神风”的援助下，元军的第二次侵日战争宣告失败，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直至1299年，元朝派妙慈弘济大师出使日本，才重新恢复了中日关系。

十四世纪后的日本，是封建诸侯实行武力割据连年混战的战国时代。那些战败的武士、无业的浪人和唯利是图的走私商人，结成海盗团伙不断对中国沿海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各省，进行烧杀抢掠，史称“倭寇”之患。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多次派遣使者访日，希望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并送还被俘的日本海盗。1401年日使来华，也表示要“遵往古之法规”，建立友好关系，但海盗活动仍甚猖獗。明朝被迫在沿海设防，天津卫、威海卫、金山卫等许多以“卫”、“所”命名的沿海城镇，就是明朝设置的防倭军事重镇。后来经过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兵围剿，危害中国二百多年的“倭寇”之患才被平息下去。

综观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虽然也有曲折和不幸，但友好交往促进了两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值得怀念和发扬的历史主流。

第一章

中华帝国的衰落

第一节 盛极而衰的清王朝和 西方列强的东侵

远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朝，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大帝国。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特别是唐宋时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取得了举世闻名的辉煌成就。至明清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衰落阶段。

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以东北地区的满族为主体而建立起来的。清王朝统治中国长达二百六十七年。在前期康熙和乾隆的百多年间，平定蒙古、新疆、西藏边境地区的民族分裂活动，打败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收复台湾，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国。治理黄河、淮河、辽河及永定河，减少了自然灾害，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在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一定的成就。至1774年时，全国人口已增至两亿二千一百零二万人。

清朝初期，沙皇俄国乘中国国内战乱不止的机会，对黑龙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进行扩张，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康熙两次出兵，打败俄军收复了失地。1689年，俄国被迫与中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以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格尔齐河及外兴安岭至海为界。河南岸及阳岭，包括库页岛在内，属中国。河北岸及阴岭属俄国。从而划定了中俄两国的东部边界线。当时中国的疆土十分辽阔，西跨葱岭，西北至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

东北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至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南至南中国海诸群岛，是个国势昌盛的东方大国。

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开国初期兴利除弊励精图治，康熙和乾隆也都有安邦兴国的抱负和才能。一旦政权巩固之后，或人息政亡，或政怠宦成，逐渐转向腐败，导致国势的衰落。扩建北京的皇宫，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都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奢侈淫逸逐渐成风，这是盛极而衰的先兆。

清王朝是依靠剽悍善战的满族“八旗兵”，推翻明朝而建立起军事统治的。入关后，八旗王公人人封官加爵，赐予大量的良田和庄园，连满族士兵也无不享有种种特权。长期游手好闲养尊处优的生活，军纪废弛，八旗兵已经丧失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的。以致在后来的战争中，不得不依赖新建的以汉族士兵为主的“绿营”。

康熙时连年征战，为了筹集军费，曾实行过“捐纳制度”。地主豪绅可以通过捐钱捐粮来买官职，再利用买来的权势去搜刮民脂民膏。“捐纳制度”虽然暂时解决了军费的短缺，却败坏了用人之道，许多庸才混入官场，必然要误国害民。

贪污行贿，历来是官场的通病和顽症。乾隆的宠臣和坤结党营私干尽坏事。获罪下狱后，从他家中抄出黄金八万四千两，银元宝五万五千个，白银一百万两，各种珍宝、绸缎折价九百多万两，另有房屋一千五百多间，花园一座，良田八十万多亩，银号、当铺共一百一十五处。连嘉庆皇帝看了清单都大吃一惊。至于那些地方官员，也决不甘落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个流传甚广的民谣，很能说明官场的腐败。

上自皇帝和王公贵族，下至地方官吏和豪绅地主，都在伸手要银张口要粮，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结果使许多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主也纷纷破产。豪门权贵趁机兼并土地，土地逐渐集中于少

数大地主和官僚之手。道光年间的大臣琦善，一人就拥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亩。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变成雇工或雇农，有的流离失所铤而走险。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迅速尖锐化，终于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

以崇尚光明为教义的白莲教，是长期流传于中国民间的秘密宗教组织，清朝时的清水教、天理教和八卦教，都是它的分支。自乾隆末年至嘉庆、道光年间，农民起义此伏彼起，白莲教是实际的主要组织和发动者。1774年山东清水教首领王伦领导的起义失败后，1796年湖南白莲教女首领王聪儿和姚之富、聂人杰的起义、四川徐德的起义，从者数万人，转战鄂、川、陕各省。清政府调集十多省的清军会剿，耗军费二万万两白银，直至1804年才把起义镇压下去。1795年苗族首领石柳邓领导的大起义，一度控制了贵州、四川和湖南的广大地区。清政府调兵十万，历时十二年，至1806年才平息了“叛乱”。震动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清军入关，很重视对降官降将及汉族地主的团结利用，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以利于巩固对人数众多的汉民族的统治。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清廷总是大权独揽。从朝廷的重臣到各省的总督、巡抚，大多由满族人担任，知府、知县以下官吏才任用汉人。《大清律例》就公开写有民族歧视的法规。强迫汉族改变生活习惯如蓄发留辫子等，都引起不少纠纷。“反清复明”口号的流行，就证明了少数满族对多数汉族统治的矛盾，削弱了国家的团结统一。

中国资本主义的幼芽，在明朝就已出现。纺织、陶瓷、冶铁、造船、制盐、制茶和酿酒等工场手工业，在沿海城镇已有相当的规模。但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就是这样一个腐朽衰败的中国，在进入十九世纪时，与加紧东侵的新兴资本主义开始迎头相撞。

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一百年间，法国、德国、俄

国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以及美洲大陆上的美国，都先后摆脱了封建制度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文明和巨大财富，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飞跃和进步。

但是，这毕竟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那些高喊“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绅士们，不仅贪婪的榨取本国人民的血汗，而且为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为了争夺原料产地和扩大商品消费市场，它们凭借着“船坚炮利”的优势，纷纷扬帆出海远征，四处抢占殖民地。

随着近代航海技术的迅速进步，中国与世界的隔绝状态被打破了。一个地大物博而又停滞不前的封建古国，终于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所发现，这是一个谁都想占有的巨大市场。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十六世纪的海上霸主，十七世纪则是荷兰人和英国人称雄的时代。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冒险家、商人和海盗，驾驶着武装船队，掠夺异国领土，屠杀当地土著居民，骗取和抢夺财物，甚至捕捉和贩卖黑人当奴隶。在埋葬着殖民地人民累累白骨的基础上，建筑起资本主义文明的摩天大厦。正是殖民地人民的血泪史，写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国周边的邻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锡兰和马来半岛，首先落入殖民者的魔掌。

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中国，自十六世纪中叶以后，也遇到西方殖民者的光顾。早在1513年明朝时，葡萄牙人就有商船来华。1553年，葡萄牙人向广州地方当局行贿，取得对澳门部分土地的“租借权”，供商人上岸留住和存放货物。后来逐渐扩大占领范围，设置官署发号施令，终于在中国领土上形成了第一块殖民地。

西班牙人于1626年占领了中国台湾的基隆港。荷兰的武装船队于1622年就占领了中国的澎湖列岛，1641年打败西班牙人，夺取基隆控制了台湾。直至1662年，中国名将郑成功打败荷兰军，

才收复了台湾。

英国人在征服印度的同时继续东进。1637年，英船四舰首次闯入珠江口，炮击虎门炮台，用武力威胁的手段，要挟中国开放口岸通商。中国军民赶跑了入侵者。1699年，英国人获准在广州设立商馆，出售毛纺织品和香料，换取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品和药材。

法国人于1728年也在广州设立商馆。美国人直至1784年才开始来华贸易。

在西方商人和海盗纷至沓来的同时，基督教的三大教派：英国的耶稣教、法国的天主教、俄国的东正教的教士们，也先后跨进中国的国门。他们相信上帝是主宰一切的造物神，宣扬人们今生要忍耐顺从，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殖民主义者利用宗教，对内麻醉本国人民，对外成为向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思想文化工具。传教士中的有些人，披着宗教的外衣，却充当了侵华活动的探路人和情报员。清朝初期，中国有十三个省建立起教堂，至1650年已发展教徒十五万人。

在开放贸易的掩护下，许多外国人在测绘中国沿海水域和城市的地图，搜集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干了很多损害中国利益的非法活动。为了维护沿海的安全，清政府曾采取了“禁海”政策，禁止人民出海和洋人交往。1685年，清政府又决定开放海禁，规定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为对外贸易口岸。至1757年又关闭四处口岸，只在广州一地通商。规定洋货进口要征收较高的关税，并公布了各种“防夷”措施，如洋人上岸只能住在由洋行修建的“夷馆”里，不准随意外出，不准坐中国轿子，不准带“夷妇”，不准在广州过冬，禁止和中国人接触等等，规定极其繁琐严格。

“禁海”政策，反映出清政府既妄自尊大又虚弱惧外的矛盾心态。不符合中外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的时代要求，有其保守落

后的一面，史称“闭关锁国”政策而受到应有的批判。但在商人和海盗同行，通商和掠夺并进的年代，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国家主权，也是需要的。那些西方殖民者的辩护士，全盘否定和攻击“禁海”政策，目的只不过是制造侵略的借口。

1774年，英国曾要求与西藏签订地方性的通商条约。1791年，又唆使和支持尼泊尔人入侵西藏，阴谋都未得逞。1793年，英国使臣到北京，要求开放宁波、天津等口岸，减轻货物进口税，要求割让舟山的海岛和广州附近指定的地区，作为英国人的“居留地”。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

当时中英两国在广州的贸易，中国占有出超的优势，英国商人只好用白银来补偿贸易逆差。英国自从占领鸦片产地孟加拉后，大力发展鸦片生产，使之成为对华贸易的主要产品。至1838年和1839年，年均销鸦片四万零二百箱，每箱一百多斤，售价六百至八百两银元。此后，中国由出超变为入超，每年外流白银在一千万两以上，鸦片贸易为英国开辟了丰富的财源。因为有厚利可图，美国商人也加入了鸦片贩子的行列。

鸦片，是举世公认的毒品，吸食成瘾会严重损害身心健康，导致财尽人亡。据1835年的统计，包括文武官员和绅商子民，全国的烟民已达二百万人。对于鸦片贸易，清政府内部长期存在着“弛禁”与“严禁”两种意见，也给鸦片的公开泛滥和走私贩运，造成可乘之机。“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鸦片的大量输入和白银的源源外流，造成了可怕的社会和经济危机。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奏折中写道：对禁烟若再等闲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国贫民弱的危险，惊醒了中国朝野的有识之士；终于迫使道光皇帝作出禁烟的决定，中英冲突由此开始。

第二节 闭关锁国挡不住洋人的坚船利炮

1839年，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于3月赶往广州主持禁烟。林则徐抱定“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的决心，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共商对策，合力缉拿烟贩，查禁烟馆，惩办包庇走私鸦片的受贿官员，大张旗鼓禁戒烟毒。

3月18日，林则徐通告外商：三天内将鸦片全部交出，听候处理。英国驻华商务督办查理义律，对收缴鸦片提出抗议。他拉拢美国商人共同行动，拒绝交出鸦片。同时下令英舰示威挑衅，进行武力威胁，幻想迫使林则徐收回成命。

林则徐庄严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决无中止之理。”针对英方的挑衅，林则徐下令封仓查库，断绝英舰的水源和食物供应，珠江口沿岸炮台加强戒备，招募渔民编练水勇，准备对付英军的侵犯。对于各国对华的正当贸易，则继续予以保护，只要确保不携带鸦片，都可进港卸货。

相持月余，查理义律见拖延不成威胁无效，开始被迫交出鸦片。至5月间，共交出鸦片两万多箱。（内有美商的一千五百箱），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

6月3日，林则徐率领文武官员亲临虎门销烟。先在海滩挖池浸泡，再投入石灰使之沸腾销毁，最后引入潮水冲入大海。至25日销烟宣告结束。虎门销烟，是世界禁毒斗争的创举，打击了英国商人的公开贩毒活动，鼓舞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受到了国际舆论的赞扬。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改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从7月至11月，英舰不断炮击中国炮台和水师船只，寻隙报复，都未得逞。林则徐料定英军“不能在粤思逞，必改窜他省”，连续五

次上奏，建议加强沿海防务。

虎门销烟的消息，查理义律通过密信，于8月初传到伦敦，在信中他建议使用武力打击中国。那些在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的绅士们，立即发出了战争的叫嚣。

因为鸦片贸易极不光彩，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采取了“与己无关”的回避态度，如何处理虎门事件，成了英国政府的一大难题。直至1840年3月19日，英国政府才向议会宣布了出兵的决定，理由是英国臣民的生命、货物受到暴力地侵犯，大英帝国受到中国的侮辱。议会中的反对派抨击了政府的战争政策，指出鸦片贸易是“罪恶”和“有伤道德”的。“没有比这个战争在起因上更不正义”，是“更足使我国永远背上耻辱的战争”。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262票反对，271票赞成，以微弱的多数，通过了出兵的军事预算。

乔治义律被任命为英国“东方远征军”司令。部队由就近驻印度、锡兰的殖民军抽调组成，共五个团，配属一部炮兵和工兵，共约四千人。军舰十六艘，其他运输船等三十多艘，大炮五百四十门。1840年6月22日英军发出《通告》，宣布封锁珠江口，封锁令于28日生效，以此为标志，中英两国处于战争状态。

英军首先进攻虎门炮台，林则徐亲临指挥严阵以待。乔治义律见无隙可乘，北上攻厦门，又被邓廷桢率兵发炮击退。7月5日，英军攻占舟山群岛定海县，登陆成功。主力继续北上，8月9日英舰侵入大沽口。英方发出通牒，要求清政府赔偿因销毁鸦片而给英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割让沿海岛屿一处或数处，作为英国臣民居住贸易的地方。

英军兵临天津，清廷震惊。过去就反对禁烟的直隶总督琦善等大臣，乘机攻击林则徐“招来祸端”，宣扬英军“船坚炮利”凶猛难挡，主张妥协“抚夷”。道光派琦善去天津议和，表示林则徐“措置失当”，“必重治其罪”。要求英舰南返广州继续谈判。9月28